

尼克索短篇小说选

(丹) 尼克索著

新文艺出版社

尼克索短篇小說選

楊霞華等譯

新文藝出版社

一九五七·上海

Мартин А. Нексе

РАССКАЗ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4

尼克索短篇小說選

(丹麥)尼克索著

楊霞華等譯

*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1號

華文印刷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1093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5 1/16 字數 97,000

(原上海文藝聯合版印6,000冊)

1956年9月新1版

1957年6月第2次印刷

印數 1,501—4,500 定價(6) 0.42元

內 容 提 要

一生致力於爲各民族間的和平、進步和自由而積極鬥爭的馬丁·安德遜·尼克索，是被稱爲“斯堪第那維亞的高爾基”的現代丹麥最卓越的作家。他的作品，除了長篇小說“征服者貝萊”，“狄蒂”，“赤色分子莫爾頓”之外，還有許多短篇小說。這個集子，選譯了他從一八九三年以來的十一個短篇代表作。這裏有最著名的“空座位的旅客”，作者描寫了許多失業的無票乘車的旅客的命運的典形性，並指出了作家的任務，不僅要描寫這種形象，還應當參加到他們爭取利益的鬥爭中去。在“買彩票的瑞典人”這一篇裏，作者描寫了一個採石工人的悲慘的歷史。“麵包”和“婦女的革命”是作者旅行西班牙的收穫，這裏表現了西班牙人民的火熱的鬥爭。“候鳥”揭露了小資產階級的哲學對普通人民的影響。這十一篇小說包括了很廣泛的題材，描寫到各階層的人物，主要的意義是給讀者指出了什麼是正確的無產階級世界觀和鬥爭道路。

馬丁·安得遜·尼克索的短篇小說

雅 赫 喜 娜

尼克索所作的短篇小說總共有八十多篇，其中大部份是在他的創作道路的開端，在他的革命世界觀形成的時期所寫的。尼克索是作為一個從嚴峻的無產者生活鍛鍊中成熟的人踏進文學界的。這位新進的作家，有過艱苦的兒童時期，在“人間”——丹麥勞動人民中間——過了悠久的歲月。

他迫切地企圖在他的作品中敘述丹麥勞動人民的生活，他們所受的剝削和貧困，以及已經開始的無產階級革命鬥爭，從而“推動其他的人改善人類生活條件，改造全世界”，這種願望把筆桿放進了青年尼克索的手中，規定了他早期小說的題材。不過作者本人在自傳裏表示，雖然他的思想上的敵人懷疑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他對於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却還認識得不够。可是對於他，無產者的兒子，自己又是一個無產者，“社會主義的實踐立場”是很接近而又親切的，生活本身使他站穩了這個立場。從保衛“社會主義的實踐立場”出發，尼克索開始了他的創作的道路，使他後來成為作家——共產主義者，爭取和平及社會主義的自覺的思想戰士。

一八九八年，尼克索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陰影”問世。其

後有“鰐鼠坵”(一九〇〇—一九〇五)，“無底深淵中的聖詩”(一九〇八)，“我的童年的海濱”(一九一一)，“蓬霍爾姆短篇小說集”(一九一三)，“在蔚藍的天空下”(一九一五)，“深水魚”(一九一八)，“途中”(一九一九)，“空座位的旅客”(一九二一)等。一部以“鰐鼠坵”爲總名的三卷集(一九二二—一九二六)算是給尼克索在這幾年間所作的小說體的作品做了一個總結。以後的幾個集子——“黑鳥”(一九三〇)，“走向光明”(一九三八)，“鰐鼠坵”(一九四六)，“空座位的旅客”(一九四六)——把舊有的短篇小說跟一些新的作品收集在一起，其中最好的幾篇曾一再重見於若干選集裏面。

尼克索的短篇小說的主題是多種多樣的。它們裏面有西班牙給作者的印象的反映(“婦女的革命”，一八九五；“結局”，一八九五；“麵包”，一八九六；及其他)，有他對德國的多年的認識(“容克爾”，一九一二；“玩偶”，一九一五；“悲慘的雜技演員”，一九二八，及其他)，有他對革命後的俄羅斯生活的最初的觀察(“穆士達法”，一九三八)。不過，短篇小說家尼克索的基本主題都是他同時代的丹麥生活。

尼克索描寫丹麥情況的小說是以包羅現實的廣泛性使人吃驚的，其中描寫了茹特蘭和蓬霍爾姆，都城和省區，城市和鄉村。它們裏面的人物是農民和僱農，工人，手工業者和城市“底層”的居民，漁夫和水手，城市的資產階級和教士階級。

儘管在主題上多種多樣，但是讀者却是把尼克索的短篇小說當作一部長篇小說的章回來看待的。作者的具體生動的傳記，

貫串在許多短篇小說裏面，有時與作品的內容分不開，但很少使人感覺到它們彼此間的關聯。可是，尼克索創作計劃的統一性把它們聯繫起來，給每一篇短篇小說在現實的全景中，在關於丹麥的真實敘述上，有一個確定的地位。

尼克索筆下的丹麥，並不是反動的資產階級和富農階級的思想家所描寫的田園詩那樣的宗法國家。這是一個有着尖銳的社會矛盾，有着劇烈的階級鬥爭的丹麥；一個剝削者的丹麥——同時也是窮困的勞動者的丹麥。尼克索的短篇小說把這兩個丹麥——少數人太富有的丹麥和多數人太貧困的丹麥——描寫成爲是彼此相生相成的。這兩個丹麥的比較使尼克索得到必須根本改造社會的革命性的結論。

在尼克索的小說題材中，丹麥勞動者的形象佔有中心的地位。在描寫這些形象當中，表現出作者一年一年成長起來的無產階級的人道主義。尼克索在他的描寫勞動丹麥的作品中所努力灌輸的不是憐憫“小人物”的思想。尼克索筆下的勞動者，從他們的能力來說，乃是“以綠枝撐天”的大人物，能够創造奇蹟和偉業的人。他們把土地變成樂園（“上帝的愛子和魔鬼的寵兒”，一九二一；“強壯的漢士和紅旗”，一九三八），把長荊棘的荒土變成肥沃的田地（“樂園”，一九一二）。他們的象徵是“手上的糙皮”。“勞動的手”的形象貫串在尼克索的許多關於窮人的短篇小說裏面。“世界上再沒有任何東西比窮苦老婦人疲敝地垂着的手更美麗的了，”作者看着年老的女工起胼的手下斷語說（“空座位的旅客”）。尼克索熱愛勞動人民，無論他是石工劉得

維格（“一日之王”，一九一〇），巧手的鞋匠尼撒（“候鳥”，一九〇四）或跟自然災害作鬥爭的勇敢而機智的漁人（“隨浮網順流而下”，一九〇五）。不過，在寫無產階級勞動者概括的形象時，尼克索也常把他描寫成帶了鏹鏹的壯士，他的俊美的身體“泥污和疲累得不成樣子”。作者無情地大力譴責和咒詛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的勞動。在尼克索的短篇小說裏，剝削，貧困，恥辱，疾病與勞動者結了不解緣。人民勞動的果實歸剝削者所得（“樂園”，“強壯的漢士和紅旗”）。奴隸式的勞動是農村無產者的命運（“白痴”，一九〇九）。極度窮困的生活成了城市公務員的本份（“愛之子”，一九〇七）。尼撒以進救濟院收場（“候鳥”）。從人民中出身的人愈是有天才，他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的遭遇就愈加悲慘。

尼克索在他的描寫天才者的命運的短篇小說裏，揭穿了在資產階級社會裏人人可以表現自己的才幹這個荒謬理論。“卓越的天才者埋沒在人民裏面，看不見光明，假使這些天才者的一小部份能有充份的發展，全世界的情形便會兩樣了，”尼克索在短篇小說“忠誠到死”（一九二九）裏這樣寫。出身於人民中間的人的成就，只有在偶然的機會中才能得到（“玩偶”，一九一五）。與此相反的，在我們面前有一大批葬送了生命的人。喜研究，有才幹的貧農霍爾姆成了迷信的犧牲者（“墳場”，一九〇七），“窮人的歌鳥”技工樊格失去了嗓子（“街頭歌手”，一九一六），“音樂天才者”貧農彭恩喪了命（“忠誠到死”）。

尼克索在短篇小說“樂園”裏，痛心而憤怒地談到資本主義世界裏的窮人的命運：“許多人以為，倘若窮人生活得不好，那是

他自己的錯處。但是，老實說，窮人從來不想自殺，他們倒是能經常注意環境的。”

若干“具有典型性和人性”的人的命運，始終是尼克索注意的中心。他的大多數短篇小說是傳記體的結構，並以尖銳的社會衝突為基礎。尼克索對於他的小說中主人公所走過的道路，往往從兒童時代叙起，努力指出社會對於人的命運的影響。尼克索關於窮人的短篇小說是對社會制度的一種控訴，因為對作者來說，許多人的命運都千真萬確地說明了社會的特徵。在尼克索看來，西班牙的實際情況，決定於貧民生活的悲慘景象——失業工人唐·拉飛愛里（“麵包”，一八九六）和餓死的康查（“康查”）的遭遇，由於饑餓而產生自發性的革命（“婦女的革命”），並不是偶然的。

與敘述勞動者的傳記式的短篇小說有密切關連的，是描寫被剝奪了童年的兒童的短篇小說，尼克索用這些短篇小說來揭發資產階級思想家屢次所作的謊言，說十九世紀彷彿成了“兒童的世紀”。“沒有任何時期比工業資本主義世紀給予兒童那樣大的害處，”——中篇小說“小孩”裏的這句話可以給尼克索關於無產階級兒童的短篇小說作為一種警句。尼克索帶着深切的同情描寫不知有童年幸福的窮人的孩子（“垃圾堆上的幸福”，一九〇二；“飛逝的夏天”，一九〇九）。尼克索應烏拉爾區兒童的請求，為他們的集子“烏拉爾——黃金的土地”寫了一篇自傳體的故事“白鳥”（一九四〇），是把蘇維埃兒童的“黃金的童年時代”來跟資本主義世界中的無產階級兒童黯淡的日常生活景象作了

對比。

作為無產階級人道主義者的尼克索，並不把對勞動人民的熱愛與對他們的壓迫者的憎恨分開來。

尼克索拿“饕餮者”的——資本的——世界，掠奪與剝削的世界來和“勤勞的手的世界”相對照。他指出了城市與鄉村裏的資本主義的剝削（“白痴”；“領工資的日子”，一八九七；及其他），所謂“民族精華”——富農階級——的獸性（“斷腸兒”，一九〇一；“溺死者”，一九一八），慘無人道的金錢的影響（“患癩疥的雅各”，一九三八），資產階級的司法與虛偽的道德（“富蘭卡”，一八九八；“愛之子”，一九〇七）。尼克索還揭發了“社會麻醉藥”——宗教，它在丹麥產生出許多麻醉人民並使他們不去從事社會鬥爭的教派（“兩兄弟”，一八九七；“青年時代”，一九〇三）。最後，在許多短篇故事裏，作者指出了由資本主義所產生的戰爭的可怕後果（“殘廢者”，一九〇一；“兩個女人”，一八九九；“烏鴉”，一九一四；“黑鳥”，一九二八；“死的跳舞”，一九一七，及其他）。

在尼克索的諷刺作品裏特別鮮明地表現出對資本主義世界無情的抨擊。尼克索創造性地發展了革命諷刺的優良傳統，在他的寓言，短論，短篇小說裏所譴責的不是他那時代的制度的個別罪惡，而是資本主義——社會，政治，思想各方面——的根本基礎。

在“人人輪到”（一九〇四）這篇諷刺小說裏，尼克索揭發了關於丹麥農村的幻想的“團結”的傳說。終年的艱苦勞動，收穫

節的一點殘羹剩飯，使貧農和僱農不得不發出怨言。可是作為封建資本主義的丹麥化身的頭一班飲宴者，儘管表面上看去意見紛歧，却齊心協力地維持着這個已成的秩序，舉杯祝頌國王健康。在諷刺小說“無謂禮節的上帝”（一九〇六）裏，丹麥君主政權成了揭發的對象。國王在這篇小說裏表現為一個可憐的角色，在司儀員——反動派——的笛子指使下跳舞。尼克索預言王朝政權免不了要滅亡。人民摧毀了“以陰暗遮蔽了全國”的帝王的基礎，着手開闢通向未來的光明道路。在短篇小說“會見”（一九一〇）裏，他又描寫出有諷刺意味的資本家的形象。資本家的形體的顯著特徵是他沒有手。尼克索用這種細節來強調說明資本主義沒有能力從事創造，說明它的破壞的，剝削的實質。

在“上帝的愛子和魔鬼的寵兒”裏，提出了饕餮者——資本，無產者的勞動果實全部消失在他的無饜的肚皮裏。諷刺性的寓言“烏鴉”是用來揭發帝國主義掠奪者。機會主義與妥協主義則成了“狼和綿羊”（一九一五）的諷刺對象。

尼克索毫不留情地揭發了資產階級的思想。他的早期諷刺作品“懂音樂的小豬”（一八九七）譏笑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暴露了生長在糞堆——富農的丹麥——上的“高等豬獃”的無頭腦。尼克索確鑿地指出“高等豬獃”（使青年糾正“豬性思想”的“懂音樂的小豬”，在牠的同輩中是以自由思想家馳名的）的個人主義的叛變，事實上表示完全安於“豬的現實”。找到了走向豬槽的門路，小豬便得到這個結論，“每一頭豬各有適應於其本性的地位”，並開始“吃、喝、睡覺”。這篇小說清晰地說明了這個

主題，即小市民個人主義者“人性的破壞”，奢望騎在衆人頭上，爲被選舉人而創作的藝術家枉自生存，白費活動。

貫串在尼克索全部小說的字裏行間的兩個丹麥的主題，按照作者思想和藝術的發展而成長，而變革。我們要讀尼克索創作的發展，雖然應該從他的全部作品來看，但是這位作家的短篇小說已鮮明地說明了他的道路，即從保衛“社會主義的實踐立場”走向表現革命無產者完整的世界觀，從初步創造特有的風格並克服自然主義文學的影響，走向確立由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特點豐富起來的現實主義方法。

作者把他的第一部小說集命名爲“陰影”（一八九八）；一九三八年出版的最後集子之一則命名爲“走向光明”。尼克索的集子的題名全都是經過深刻思考的。甚至這兩部書名的簡單對照，便告訴我們，作者從揭發黑暗的資本主義現實開始，找到了走向光明，走向爲社會主義的將來而鬥爭的道路。

尼克索同樣慎重地考慮到他的集子的結構和組合。他一貫地把早期短篇小說中最好的幾篇收進這些集子裏面，這些小說，與後來所寫的一些作品結合在一起，便取得了全新的音調。在後來的集子裏所描寫的過去的事情，彷彿是在爲將來而鬥爭這個觀點之下賦予了新的意義，在尼克索的作品裏，將來的聲音是愈來愈洪亮了。

丹麥工人運動的發展，在尼克索的思想的成熟上，起了決定性的作用。生活上和創作上的這個新階段的開端，在尼克索來說，是標誌着他與社會民主黨割斷了關係，參加並建立了丹麥

共產黨。有國際意義的事件，如一九一四年的世界大戰和勝利的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所完成的俄羅斯革命運動，對於這位作家起了最巨大的影響。

作為尼克索創作的特徵的，是一系列“透澈的”，意義重大的主題，這些主題使這位藝術家一生都在感動。在尼克索的作品裏，一再重複着自傳的調子和在好幾篇作品中都出現的個別人物形象。但是他處理這些主題，調子和形象，絕不是把他以前所寫過的東西簡單地重述一遍。

尼克索思想的成長，他的現實主義方法的深刻化，很容易在他的短篇小說的材料上看出來。

經常激動着這位作家的主題之一，就是與帝國主義有不解緣的戰爭。尼克索始終是與戰爭販子勢不兩立的，爭取和平的積極戰士。不過，在他的根據一八六四年事件所寫的最初幾篇反戰短篇小說裏，尼克索主要是反對殘害人精神和肉體的戰爭的非人道主義本質（“兩個女人”，“殘廢者”）。作者對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有了另一種領會。在戰爭年代的政論和短篇小說裏，尼克索把靠戰爭發財的帝國主義者跟承擔戰爭負擔及其悲慘後果的人民明確地劃清了界限。在寓言故事“烏鴉”裏，尼克索直截了當地指出了戰爭的罪魁禍首，揭發了軍國主義的宣傳。“當土地統治者開始在聖壇上勾結上帝，並宣告他的事務是天授的時候，就一定要有戰爭擺在面前，”他這樣寫着。在根據德國戰爭活動創作出來的短篇小說“死的跳舞”裏，尼克索描寫了受戰爭蹂躪的，挨饑受餓的近郊工人區和“世界的統治者”——戰爭

利潤流入口袋裏的軍火製造商。

在這些年代的小說裏，作者的戰爭主題轉變為工人革命鬥爭的主題了，工人所反對的是那些把武器放到他們手中的人。（在短篇小說“自由的仙人”中所描寫的德國工人革命家，把工人們為了帝國主義者的利益而互相殘殺的戰爭，和無產階級為了爭取更美好的將來而從事的革命，作了明確的區別。）“戰爭的血，是手足相殘的血，”他說，“至於革命的血，那是健康的血，每一個種族都免不了要流的。”

社會鬥爭的主題在尼克索的小說裏也得到更深一層的解答。它在作者的最早的一些短篇小說裏就已經發出聲音了。關於饑餓的西班牙婦女的自發性革命的短篇小說充滿了對西班牙勞動人民的熱烈同情（“婦女的革命”，一八九五）。在“領工資的日子裏，”作者用巨大的藝術力量描寫了工人當時還是默默無聲的，對石礦主的侮辱的反抗。

在作者其他早期短篇小說裏，可以看到在最落後，最受壓迫，最受折磨的人們——僱農，漁夫，手藝工人——裏發出的最初的反抗火花。巨人拉爾斯殺死了傳播宗教的假仁假義毒素的教士（“兩兄弟”），僱農放火燒了可恨的業主的農場（“白痴”）；鞋匠布朗克殺死了奪去貧民棲身之所的屋主（“牆壁”，一九〇七）。

被壓迫者的反抗引起了尼克索的深切同情。不過作者却指出了單獨鬥爭是徒勞無益的，被混亂地理解的追求自由必然會遭到失敗（“候鳥”，“樂園”）。

尼克索正確地看出，人民羣衆的，首先是無產階級的有組織

的鬥爭，是革命運動的一條坦蕩大道。這種鬥爭的述敘在作者的創作中佔了重要的地位。

尼克索長篇小說，形象化了丹麥工人運動的各個階段，描寫了前進工人深刻地個性化的形象，社會民主黨上層人物的賣國行爲。在短篇小說裏，他寫了把人民羣衆舉到波峯上的“造出奇蹟的波浪”。同時，尼克索在短篇小說裏不是敘述這場鬥爭的插曲的各個畫面，而是力求把它作綜合性的形象化。

在描寫革命的人民上，尼克索是傾向於貝爾·哥里克，強壯的漢士的民間故事式的形象。這個不朽的形象表現出團結的人民的力量和偉大，表現出作者對無產階級完全勝利的信心。“先生，我們是我們故鄉不大值錢的土地的繼承者，”尼克索用貝爾·哥里克一族人的名義說，“可惜我們還不能掌握它。有幾個地主用欺騙的手段把它從我們這一族人手中奪了去。但是我們正在反對他們，我們的回轉故居只不過是時間問題”（“容克爾”）。

在短篇小說“上帝的愛子和魔鬼的寵兒”裏，無產者是被描寫成大力士，創造的榮冠。他的“血液裏沒有憤怒”，所以讓人把他拘禁起來。“該死，爲什麼你不打破你的枷鎖呢？”這篇小說是在俄羅斯無產階級掙斷了自己的鎖鏈，獲得了勝利後不久寫成的，在這裏面，作者直截了當地喊出了鬥爭的號召。

十月革命的勝利，尼克索的加入共產黨，幫助這位作家形成貫徹到底的革命觀點。在尼克索來說，機會主義在工人運動中的賣國性的作用是愈來愈明顯了。在尼克索的作品裏——不但

在長篇小說，而且在短篇小說裏——發出了揭發機會主義的主題的音調。尼克索在寓言故事“狼和綿羊”裏對膽怯的妥協分子——綿羊——加以無情的嘲笑。尼克索是用綿羊欣然採納狼的建議：決議把森林的半邊築柵圍起來，而讓另外半邊敞開着，揭發了妥協決心和自由改革的思想。“用這個辦法將使雙方的合法權益都得到滿意”，作者諷刺地說。這篇寓言簡潔而象徵地說明了，在有決定性的時刻，綿羊竟然站到狼的一邊去反對革命的羔羊。但是羔羊數目愈來愈多——“當時牠們的額上還只是離奇的疙瘩，但是有一天，牠們都長出了角”。

在寫於一九三八年的那篇小說“強壯的漢士和紅旗”裏，尼克索指出勞動者漢士走向有組織的鬥爭的紅旗道路，再一度強調說，在“好心腸”的漢士們之間，在他們對妥協者的言詞的過度信任裏面，隱藏着最可怕的危險。但是受過鍛鍊的富有經驗的鬥士們把紅旗緊握在手裏。鬥爭的教訓對於參與的人並不是徒然過去的，因為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反抗性在鬥爭中才能鍛鍊出來。

與尼克索思想的成熟分不開的，還有他的藝術技巧的成熟。

在回憶他的最初文學經驗的小說“路途的終點裏”，尼克索寫道，在那時候，周圍呈現出在他看去是這麼有興味，這麼新奇的事物，以致他認為必須把“所看見過的，所經歷過的在紙上鞏固下來”。在這方面說明了這位青年作家缺乏經驗，還不能區別偶然的事物和典型的事物，不能克服向現實“照相”的那種自然主義文學的影響。不過為日愈久，尼克索就愈加明白，即使是最有興味的生活上的材料，最動人的情況，在作家的創作意圖裏也

應該“長大起來，發展起來”。隨着尼克索創作中自然主義的克服，對深刻概括形象的趨向逐漸長成，這位作家便從描寫偶然事物轉變到描寫典型事物。

尼克索的短篇小說引導我們去參觀他的創作試驗所。在短篇小說裏有時候產生出一些形象，後來在長篇小說裏得到更進一步的發展。鞋匠畢古穆（“木脚人畢古穆”，一八九八）的速寫畫像，在“候鳥”（一九〇四）裏曾得到更鮮明的社會性結論，在“征服者貝萊”裏以鮮明的藝術形象加里波的表現出來。波麗娜（“愛之子”，一九〇七）長成爲無產階級的女性狄蒂（“人的孩子”）的令人難忘的形象。這部小說的另外一個人物，莊戶卡倫·巴克哥爾，最初是在“溺死者”（一九一八）裏出現的。在長篇小說裏這個形象才得到社會性的和藝術性的結論。反過來，有時候有些形象在長篇小說裏偶然帶上一筆，在短篇小說裏才完成。例如“空座位的旅客”（尼克索的創作中最重要的形象之一）的命運，就是這樣的。

在政論性的短篇小說“序幕”和中篇小說“路途的終點”裏，尼克索把他跟“空座位的旅客”的初次會見放在意大利旅行時期（一八九四）。“空座位的旅客”這個主題在關於丹麥人民的早期短篇小說裏以夾敘方式發出聲音，但是直到一九〇九年，她才由作者在“安·瑪麗的旅行”裏有意識地加以體現。不過安·瑪麗的悲慘傳記還不會被尼克索提高到千百萬人命運的綜合。在老婦人熊遜的形象中，這個思想在“征服者貝萊”裏表現得更加清楚，她積不起錢到故鄉茹特蘭去旅行，可是每天都有旅客們